

參政消息

• 第0129期 •
内部刊物 • 注意保存
1957年7月8日 • 星期一
新华通讯社編印

美議員汉弗來說重审对华政策的时机已經到来 認為应使我参加任何早期阶段的裁軍体系

【合众社华盛顿7日电】参议员汉弗来今天说，美国“肯定地应该鼓励美国记者访问共产党中国”并且“考虑修改”目前对北平共产党人实行的贸易限制。

这位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说：“重新审查我们对北平的政策的机会已经到来了。”

他说：“在中国大陆上，新的力量活跃起来了，这就表明政治局势可能向更大程度的独立行动方面发展而不再那末听从苏联的摆布。”汉弗来又说，美国应该设法利用这种情况并且应该考虑把共产党中国包括在任何裁军协议中。

汉弗来是在为一份长达三十七页的关于裁军和东亚与南亚安全问题的研究报告写的序言中说这番话的。

他说：“我们肯定地应该鼓励美国记者访问共产党中国以便报道那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使关于美国的消息得以透过竹幕传给中国人民。”

这位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还说，美国“应该考虑修改像贸易禁运等其他限制，这种限制迫使中国与苏联集团保持比以前更加密切的关系”。

最后他还说，“在早期阶段就使共产党中国参加任何裁军体系是重要的”，因为“只要没有对共产党中国的军备限制，这个国家就将自由自在地继续加强它的巨大的军事机器。”

“在没有把共产党中国包括在裁军体系中以前，这个体系就会有漏洞，苏联可能利用它背弃由于裁军协议而承担的义务。”

汉弗来说，朝鲜的事态发展使他相信，“在停战协定完全破产以前，我们应该对这个协定加以修正，从而使它符合联合国裁军谈判的最近趋势。”

他建议“授权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新的军事安排问题向共产党军司令部建议举行谈判，这种安排要规定裁减停战线两边的武装部队与军备和进行有效的相互视察。”

专家们在研究报告中说：“有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武器限制谈判不当忽视南亚和东亚。”他们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公开的敌对行动都是发生在南亚和东亚的，这个事实强调指出，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减少再发生战争可能性。”

他们认为“既要使军备受到限制又使政治问题获得解决的双重目的态度”“对促进该地区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

汉弗来在他的序言中说，“消除亚洲武装力量和军备负担所取得的任何进展，都能使资源得以用来加强它们自由和独立的物质基础。”

这位明尼苏达的民主党人说，美国要减少亚洲人对核试验恐惧心理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应当给亚洲人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他说，有原子核力量的国家应该设法阻止它传布到其他国家去。

然而，汉弗来说，三个拥有原子核的大国——美、英、苏——，除非它们自己愿意限制它们自己原子核爆炸物的发展和试验，否则它们就不可能期望其他国家摒弃原子时代的这种武器的。

他说，“一切国家，无论大国和小国，从普遍限制核武器发展的做法中所获得的好处将是深远的，所以没有一个国家现在能经得起忽视这样一种协议的可能性。”

【美国新闻处华盛顿7日电】参议院外交小组委员会今天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包含的结论说，在计划武器监督和进行裁军谈判时，应当把东亚和南亚包括在内。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公开敌对行动是在东亚和南亚发生的，这一事实强调表明需要作各种努力以减少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由于使各种敌对行动停止下来的协定，这个地区已经×××世界在军备监督方面的有限经验中的极大部分。此外，许多亚洲国家已经表示了强烈反对大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情绪，它们渴望用和平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

据指出，除非找到解决朝鲜、越南和中国这三个分裂的国家所造成的问题的办法，否则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将继续存在。而由于共产党中国拥有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亚洲任何监督和裁减军备的广泛体系都必须包括中国。

小组委员会主席休伯特·汉弗来（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也表示认为，应当使共产党中国在任何裁军体系发展的早期参加这个体系。

蘭尼茲尔离台赴美

在台时曾同蔣介石多次会談

【法新社台北6日电】前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军司令兰尼兹尔

将军在今天启程赴美时说，目前远东的整个形势和这些年来情况几乎完全一样。

在今天早晨的机场会议上，兰尼兹尔将军除了说他很“愉快地访问”了蒋介石总统和夫人并向他们告辞外，很少讲话。然而中国官方的新闻公报却说总统和贵宾就加强远东中美军事合作交换了意见。这位将军在访问中曾同蒋介石总统作了数次谈话，但是没有公布谈话内容。

这位将军今天早晨同蒋氏夫妇共进早餐，向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讲了话，并且拜访了中国军事领袖。

兰尼兹尔将军将绕道冲绳岛和檀香山去美接任陆军副参谋长新职。

【中央社台北6日电】前任联合国驻远东军统帅兼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兰尼兹尔上将夫妇已于6日上午离台北飞往琉球取道返美，中国军方曾以隆重军礼欢送，蒋总统夫人亦曾亲赴机场送别兰尼兹尔夫人。

兰尼兹尔于离台前一小时曾赴国防部拜会俞大维部长和王叔铭参谋总长，他们并曾举行重要会谈，就当前台湾海峡军情和中美军事合作问题交换意见。

兰尼兹尔将军登机前曾告诉记者们他这一周来的行动日程。他说：“这是我离开远东前最后一次访华，但我出任陆军新职后希望还能再来此访问”。

这位前任联军统帅拒绝透露总统和他谈话的内容，他对于“美国在海外驻军地位协定是否会因哲腊德上士杀死日妇的案件而有改变”一事，也不愿发表任何评论。他只说：“哲腊德案件正由美国最高法院研究中，关于美国在海外驻军地位协定一点，我最好不发表意见”。

当记者询问他从“他今年1月间访华后有无发现此间情势有何转变”，兰尼兹尔上将微笑说：“天气略有转变”，这位四星上将并认为从他初抵远东到今天离去“这个地区的一般情势大致未变”。

蒋总统暨夫人于5日下午八时在官邸接见前任联合国驻远东军统帅兼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兰尼兹尔上将夫妇并设宴款待。宴会前后总统曾就加强在远东军事反共合作问题与兰尼兹尔将军作广泛交换意见。

【合众社檀香山4日电】太平洋地区美军司令斯图普海军上将已经为驻有美国军队的各个地区任命了一个高级军事仲裁人，以防止像哲腊德案件这样的纠纷。

仲裁人将设法消除美国军事当局和本地当局由于处理涉及美国军人和平民的案件所产生的纠纷。

特别受到影响的国家是日本、台湾和菲律宾，在这些国家中已经发生了裁判权纠纷。

斯图普是在从东京回来以后宣布他的计划的。他在东京时接管了太平洋地区全部军队的指挥权。

斯图普说，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是为了保证“对管理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军事人员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和更好地创造和睦关系……”。

在日本，第五航空队司令史密斯中将已被任命为斯图普在这些事务方面的代表。在台湾的代表是台湾防御司令英格索尔中将。在菲律宾的代表是驻菲律宾海军司令克鲁斯少将。

印尼峇里等地四十七所华侨学校被当局封閉

【新华社雅加达6日电】印度尼西亚通讯社消息：东南省四十七所华侨中、小学已全被当局封闭，据该省外侨教育督察局局长说，这是根据当地军政长官第二十六步兵兵团团长的命令。

被封闭的华侨学校计有峇厘的十一个小学、两个中学；龙目的七个小学、两个中学；帝汉岛的九个小学和一个中学；柿巴岛的四个小学和一个中学以及佛罗列斯五个小学。

据二十六步兵兵团新闻官说，封闭华侨学校的原因，是因为很难监督那些学校的教学计划是否合乎印尼民族的教学计划，事实上华侨学校学生有80%为印尼籍公民，但他们却不注意为他们设的印尼国立学校。

新闻官说，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已送雅加达，华侨学校的最后命运仅等待中央的决定。关于华侨学校是否有复开的可能性问题，他说，华侨学校需履行一些国内的条件，例如教课的语言问题和印尼历史课程问题。

英联邦总理會議草拟最后公报时曾發生爭論

【印度报业托辣斯伦敦6日电】据联邦总理会议人士称，由于印度提出反对，联邦总理会议昨晚发表的最后公报中，已把赞成艾森豪威尔中东主义的部份以及就匈牙利事件对苏联进行的“挖苦胜的攻击”删去。

事实上，这些人士说，最后公报是参加国经过几个小时的争论之后才达成的折衷结果。最后的草案据说完全接受了印度所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

关于匈牙利事件，印度认为，它对匈牙利人民的同情并不下于其他国家，但是它认为，如把一些会使苏联的态度更加强硬起来的话放进公报里面去的话，那么这并不会那么实际的用处，而且实际上可能伤害匈牙利人自己的感情。

早些时候，在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和外交部部长纳·鲁·皮莱等人的帮助之下，以所有方面认为满意的方式修改了一些草案。

像几乎所有的国际会议的情况一样，公报的有些提法（比方说，对联合国的职能，对“有关的联邦国家政府在远东和东南亚缓和紧张局势和维护和平稳定以及政治自由方面所起的促进作用”等问题的提法上）是能够加以不同的解释的。但是印度代表团接受了这些措词，因为无论如何，不管拟定公报的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公报的表面上是没有暗示批评任何人的地方的。

“人道报”刊载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委员会上

关于苏共中央决议的发言摘要

【本刊讯】法共“人道报”7月5日刊载多列士在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摘要：

用不着我再来强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重要性。

政治局已经在昨天讨论了这个决议。问题归纳起来，是这样的：这是一场为了贯彻执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路线而进行的坚决斗争。

我们同意这条路线。我们在筹备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以及在大会进行期间都贯彻了这条路线。

究其实质，这条路线考虑的是世界上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日益强大；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日益增长，这种矛盾由于殖民制度的危机——甚至可以说是崩溃——以及一个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从帝国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国家的广大和平地区的出现而愈益严重了。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三大主导思想就是这样来的，这三个思想对于我们说来并不是陌生的，在它们里面我们找得出我们过去的某些言论。这三大主导思想涉及：

一、关于在现代已经出现的新情况下避免战争的可能性；

二、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各异问题；

三、在解决国际工人运动团结问题方面，特别是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所展开的前景。

去年秋天所发生的事件，帝国主义者为了改变事态发展而作出的挣扎（特别是从匈牙利外部发动的反革命尝试，和法国、英国同以色列借口苏伊士运河问题而向埃及进行的侵略）没有改变我们的认识；相反地，这些事件证实了我们的认识正确，加强了我们的政治结论，特别是关于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结论：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平地区各国的力量、全世界和平运动的力量终于迫使英法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在苏伊士问题上知难而退。

此外，我们提出的可以采取更大胆的步骤促进团结的论点也已经证实是正确的。在埃及遭受侵略的时候，实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世界上一切社会党——除掉在社会党国际中完全孤立的法国社会党之外——之间事实上的团结。

这样，我们的论点就得到了证实。还有，社会党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就象最近这次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所证实的，表明我们党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因而，我们政治局的委员们认为只能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基础是为执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路线、反对中央委员会内部出现的一个领导人小集团的派系活动而进行的斗争。根据这个决议的辞句，这个小集团从宗派主义、因循守旧和保守的观点出发反对（党的）政治路线。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这种派系活动、这种对党政治路线的斗争是在“党采取了坚决的方针来纠正由于个人崇拜而产生的错误和缺点，并且向国内外的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进行胜利的斗争的时候……”发生的。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有普遍的意义。

早在1956年3月，也是在伊符里，我们曾经表示同意而且展开了既反对以修正主义态度、也反对以机会主义态度解释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工作和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斗争。

例如，我们在2月间谴责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形式主义、因循守旧、教条主义，谴责了在生活中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抄袭已经过时的公式。

因此，我们赞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和方针以及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带来的各种纠正错误的措施，因为我们了解这些，因为我们自己的倡议也并不总是受到赞同的，因为我们某些想法、某些论点有时被人误解，甚至遭到反对。我愿意再次提到我们的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论断和1946年的这一论点：我们宣称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一定非同俄国同志们的道路一样。因为这些论点，我们受到过痛苦。我们党感到过沉重，这些都无助于促使人们考虑我国特殊需要和愿望的政治路线。

假如对苏联共产党所确定的任务加以研究，就可以看出这些任务是十分巨大的。昨天有一位同志向政治局说：“这些任务不仅涉及那里的人们可能谈到的改变，从方法、计划性、经济领导的观点本身来看，也是农业方面、工业方面、劳动者培养方面的天翻地复的大变动。”

这种大变动是在群众的支持下发生的，是在号召群众发挥创造性和热情，同时也考虑到已经取得的成绩的情况下发生的。实际上这条总路线和这条路线在各方面的执行，都是正确的，正如1955年6月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说明的那样。

而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上和苏联境内已经发生的变化。为了确定经济和工业管理的新形式，必须考虑这些变化。这里不仅涉及发展工农业和军事力量的问题，而且应该充分实践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准则，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这一切都是密切联系着的。这里也涉及纠正错误和缺点，使党不致重犯这些错误，从而使党得以完成一切任务、得以领导人民，同时关心人民的物质处境，关心苏联各工厂、城市和农村的劳动人民的物质处境。

最后，在国际方面，应该积极斗争，争取缓和紧张局势，保卫和平。这个斗争要正确理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这就意味着在各方面平

取大胆的对外政策，提出符合各国人民愿望的大胆倡议。

莫洛托夫同志的反对意见，主要表现在恢复同南斯拉夫较好关系的问题、同奥地利订立条约的问题和同日本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

还有，在裁军问题上，特别是在禁止试验核武器方面，苏联对外政策的主动已经获得良好的结果。

这是一种大胆的政策，这是一个感觉到自身强大的国家的政策，这个国家相信自己的原则牢不可破、信任自己的人民、信任一切国家中支持苏联的人民群众。

这个小集团的同志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没有能够正视新情况。他们始终做了过时的公式和陈旧方法的俘虏。他们表示过赞成党的路线，例如他们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的演说中就表示过，但是他们虽然在总的方面表示赞成，却在细节方面加以反对。

他们实际上是反对外交政策方面的各种措施的。他们批评外交政策的新的方式方法，批评各种声明和访问外国之行，例如印度之行。

当然，经济的改组使得那些比较重视字面、不大重视精神、因而看不出这些改变所以必要的人们不知所措了。发展农业生产是绝对必要的，对工业本身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来说都是必要的。赫鲁晓夫提出了开垦生荒地的主张。应该象过去列宁做的和后来斯大林做的那样做，他们都曾号召人民、号召青年组成阵线反对反革命。这样做是可能产生直接结果的。全新的生活诞生了。这是一种正在实现的伟大思想。但是同时，还应该关心集体农庄。

关于民族政策也是如此。全体同志都很了解：如果要从根本上发展共和国的经济，这种任务不仅提出了责任，而且提出了要求。为了发展共和国的经济，就必须对这些共和国更加信任，在行政和政策方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而这是一个必须贯彻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

另一个问题：这个小集团反对同进步政党和社会党建立新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就我们这方面而言，例如关于法国社会党的莫斯科之行，我们早在1954年就认为：此行可能是有益的，我们的这种看法是对的。

因此，大家都看得清楚：这个小集团的同志们并没有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得出上述种种结论，也许我还可以顺便提一下，大家现在已经更了解了：反对个人崇拜斗争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在遭到多少有些直捷了当反对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因此提出是很不容易的。看来，为了克服这些反对意见而采用的办法似乎是向代表大会、向全党发出呼吁，是消除某些同志的迟疑。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小集团的同志们反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措施，他们并不满足于在党的组织内讨论。他们甚至于进行了小集团活动。他们采取了一致的步调。他们的派系活动威胁到党内团结。而党内团结对一切共产党人来说，特别是对领导苏联这个大国的党来说，却是最宝贵的东西。党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因此，当中央委员会知道了这些人进行派系活动的时候，委员们十分愤慨。中央委员会内部没有丝毫的迟疑。中央委员会甚至想过把这个小集团的同志们开除出党。

但是，必须说明：如果反党集团的尝试得到成功，就会导致一种宗派主义的狭隘方针，导致有害于苏联共产党政策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行动。而这对于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工人运动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惩处是严厉的。小集团成员被取消了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我们完全理解而且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我们过去也曾遇到过这种试图；对于那些想要进行瓦解党的派系活动的人，我们给予了打击，今后还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打击。“真理报”社论及时地提醒了我们：在党内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进行讨论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但是，不容许动摇经由民主方式作出的一切决议的执行，不容许制造派系活动。

资产阶级报刊以及敌视我们党、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当然将像惯常那样地大事喧嚷。但是，他们终将不得不承认：涉及的问题是坚决执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依据缓和国际局势、保卫和平、尊重革命法制、恢复国际工人运动团结（这些都是切国家千百万劳动者所关心的问题）的方向执行这个方针。

他们现在和将来都不得不告诉读者：这不是一时的政策，已经作出的决定是符合群众利益的。

这就是说，甚至于他们也将不得不注意我们所认为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根本要素，即，关于在现时代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关于团结的看法。尤其因为如此，我们将更加大力地开展上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所决定的关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的宣传。

也会有人说：“苏联立国已经四十年，怎么能够还有分歧，还要制裁？”我们回答说：“你们不是总在说：苏联没有争论么？”现在，苏联正是在争论。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奇怪。如果经过那种变化之后没有争论，那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过去曾经有过没有争论的时期。提出相反意见的人遭到了行政措施、官僚主义措施的排斥。现在，有了争论，而且作出了结论。因此，这是恢复正常生活。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毫不迟疑地一致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现在应该提出它的意见。必须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引导讨论，启发和教育积极分子。

毫无疑问，我们这样做将有利于共产主义事业，有利于和平与进步事业。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一定会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有利的结果。

保共中央發表聲明支持蘇共中央決議

【法新社索非亞7日電】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星期六晚上發表一項聲明，宣布它完全支持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近對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所作的決議。

聲明說，這個決議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國際工人階級運動都有頭等重要的意義，這表明蘇聯黨和它的中央委員會保持着“不可動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團結”。

英“外事報道”談尼赫魯在國內外的處境

【本刊訊】英“外事報道”6月27日以“兩位尼赫魯的苦惱”為題報道說：在印度總理賈瓦哈爾·尼赫魯前往倫敦參加英聯邦總理會議的同時，他的親戚、印度財政部常任部長布·克·尼赫魯先生前往華盛頓進行訪問。印度總理關心跟他同名的這位親戚的訪問結果甚至可勝於關心他自己的訪問結果。賈瓦哈爾·尼赫魯是在以前一直沒有受到挑戰的他個人的地位遭到威脅的時候前去倫敦訪問的。他可能是希望布·克·尼赫魯先生將帶回足夠的關於財政支持的保證，以便抵銷德里的越來越多的批評。但是布·克·尼赫魯先生的訪問看來可能大大落後於德里的夢想。賈瓦哈爾·尼赫魯的地位和布·克·尼赫魯先生的訪問可以分析如下：

甲——總理：尼赫魯先生由於他在國內外的失敗或者失算，目前正在遭到批評。例如：

(一) 在國外：批評他的人說，(1) 他使印度同共產黨集團發生過份密切的關係；(2) 由於許多年來的反西方說教，他在聯合國討論克什米爾問題的時候使印度陷於孤立（只有俄國給予令人難堪的支持）；(3) 由於在匈牙利問題上含糊其辭，由於粉飾了梅農先生的錯誤和支持了納賽爾中校，因而破壞了印度的中立；(4) 對五項原則抱着幻想。俄國對匈牙利的干涉和中國對尼泊爾的干涉已經使這五項原則變成了笑柄。

(二) 在國內：尼赫魯在國內所遭到的譴責更加嚴厲，對於任何政界人士來說，國內政治根本上比外交事務更加重要。主要的批評是：

(1) 據說省邦重新劃分問題處理不當，從而導致了孟買和奧里薩的騷亂，這兩個地方在選舉中都拒絕了國大黨。

(2) 經濟困難。缺乏外匯的情況是嚴重的。預算已經向印度人表明，第二個計劃意味着犧牲，他們正在懷疑尼赫魯先生是否應該要他們執行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

(3) 物價上漲、糧食缺乏（據說比哈爾接近飢荒）。

(4) 選舉和爭權奪利，這兩者已經暴露出國大黨是一個腐敗，醉心權力和階級重重的政黨。

(5) 共產黨在喀拉拉邦的勝利。據認為，如果國大黨領袖當初作過更大的努力，這種勝利原可以防止的。

(6) 據說為了世俗的利益而偏袒穆斯林少數民族，以各種改革“打破了信奉印度教徒的傳統的生活方式”。

正統的力量——普遍承認是由內政部長潘迪特·潘特領導的——現在看來正在利用目前關於尼赫魯先生是否應該退休以便重新加強他的政黨——像吳努在緬甸所作的那樣——的談話作為一個逐步排擠總理的狡猾運動。由於工作過度而筋疲力盡的尼赫魯先生是對付不了這種挑戰的。

乙——財政部長。世界銀行將要給予印度的國營鐵路一筆貸款。各種安排將在布·克·尼赫魯先生下周離開華盛頓以前，予以解決。當“外事報道”出版的時候，貸款的多少還未決定。世界銀行表示願意提供75,000,000美元，但是印度人希望得到100,000,000美元。但是甚至這個數目都會遠遠落後於德里的期望。世界銀行行長尤金·布萊克一直在設法安撫兩位尼赫魯，他暗示在一兩年中可能再提供一些資金。

在談判中，印度人對於世界銀行偏袒私營企業的偏見表示不滿，布萊克先生大概對於印度關於外國私人資本的法律所產生的令人沮喪的影響表示不滿。的確，世界銀行去年給了巨大的塔塔鋼鐵公司一筆貸款，拒絕給予被收歸國有的鋼鐵工業的貸款，而包括鐵路在內的公用事業是有資格得到貸款的。的確，目前還在進行談判，要求得到貸款為孟買港和科伊納的动力工程提供經費。然而，印度人很不愉快，因為他們為了為印度經濟的私營部分籌集足夠的款項所作的努力已告失敗。

事實上，目前印度可以利用的外國資金來源寥寥無幾。至於大量的支持，它只能指望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由於世界銀行已經證明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印度人目前正在指望從擬議中的為數二十億美元的發展基金得到款項。預料國會將作為援外計劃的一部分通過這筆基金。但是日本、幾個拉丁美洲國家、西班牙和土耳其等國家正在爭奪第一位。

埃報報道沙特阿拉伯國務大臣正在開羅 試探舉行圓桌會議協調阿拉伯各國的政策

【法新社開羅6日電】比利時通訊社記者報道：“開羅報”今天宣布阿拉伯各國首腦大致將在下月間舉行圓桌會議，以便協調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傾向並且結束最近約旦事件以後某些阿拉伯國家之間現在存在的緊張局勢。

報紙指出：5日任命擔任負責聯合國事務的沙特阿拉伯國務大臣舒凱

里（前任阿拉伯聯盟副秘書長），目前正在訪問阿拉伯各國首都，以便試探各國政府對舉行擬議中的上述會議的意見。

“開羅報”接着說：今天到達埃及首都的舒凱里帶來沙特國王給各國首腦的口信，這個口信等於邀請參加上述會議。

波蘭“政治周刊”載文：“黨和報紙”

【本刊訊】波蘭“政治周刊”（1957年5月第十一期）以“黨和報紙”為題發表了格羅什克維奇的一篇文章，文如下：

在我們國家，我們可以馬上說，在黨內，在一定的時期，存在着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我們簡略稱之為報紙問題。如果回顧一下不很久以前的幾年，就會很容易地發現，這個問題並不是永遠存在的。從早就確定的作為黨的建設問題來看，報紙的作用以及它對黨的關係永遠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報刊的作用受到過去那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和黨的限制。的確，報刊對於形成政治和黨的生活的事業的獨立和創造性的貢獻受到了限制。簡言之，過去報刊的職能就是重複已經形成的論點和思想。因此，引用別人的話，以及和這種作風分不開的“乾巴巴的語言”得以盛行。這樣的報紙不會受到社會的尊敬。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也不理會這種報紙。在很早以前（我說的是人民波蘭的情況），黨的積極分子就認為，報紙是與黨没有什么關係的東西。雖然有過這樣的年頭，當時報紙順利地完成了領導機關的每個指示，表面上說，成為黨同群眾聯繫的可靠的紐帶，黨同報紙的關係可以說是值得夸奖的。那時，還是許多人把這種情況看成是不避免的壞事（現在也是如此）。都是由黨的機關中出來的人做報紙工作，很少不是這樣。從這裡可以看出，普遍忽視黨的宣傳和教育任務而助長了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的更深刻的根源。同時應當注意這樣一個事實：由於黨機關對自己的報紙採取忽視的態度，隨着社會不重視報紙，而使報紙逐漸失去了作為社會輿論的組織者和代表的正確作用。過去不須要十分注意報刊，因為它完全處於各級黨機關的支配之下。許多人對於在形成輿論方面由於這種情況而產生的困難和失敗置之不理，認為没有什么大意義，完全依靠命令和指示。

恐怕就是在這幾年發生了對於進一步發展報刊來說最危險的現象。發生了把記者、特別是評論家的職責同黨和社會活動家的職責分開來的現象。同整個國際革命運動和波蘭革命運動以及馬克思列寧時代的優良傳統相反，我們黨的活動家拋棄了政治活動同政論活動相結合的做法，放棄了宣傳工作，忽視這一工作，並且把這項工作完全推到專門做宣傳和報紙工作的人的身上。在布爾什維克黨的草創時期，曾有個這樣的時候，當時中央編輯部的作用同黨中央委員會的作用差不多。如果回顧一下波蘭共產黨，那今天就很難確定，當時黨靠什么受到了更多的教育和鍛煉，靠“新評論”，還是靠全黨的文件和材料。這裡我不打算把黨的領導和對黨員的教育的一種形式作某種對比。相反地，我想指出兩者的有機的統一。在爭取政權的年代或是在今天必須日常地注意國家大事和群眾的事情的時候，也不應當單純地把黨的領導機構的職責和義務加以對比。但是，這並沒有改變由上面指出的事實產生的有害的後果。

另一方面把社會活動家的職責與記者，評論家的職責分開，可使得報刊工作幹部開始接着任何一種其它職業的典範編制。很多年來報刊的編輯部里所招的人，雖然是大學畢業的，但不是社會活動家。他們實際上沒有經過應有的訓練，不能完成自己重要的政治職責和黨的職責。誰也沒有發現黨的舊的形式和領導的行政命令方法，（對報刊的領導也是這樣）存在了多久。在斯大林死後情況發展的基礎上報刊對自己的工作做了批判性的分析，而不再願意繼續按老一套方式工作，只到這時候，才紛紛吵嚷起來。

應該指出，在這動亂和爭取革新的幾年中，報刊起了極重大作用。它在爭取改革自己的面貌和社會職能的鬥爭中也如在推動黨內部，國家內部和人民內部整個變化過程的發展一樣，有着絕對的功績。當然，錯誤和有害現象也是有的。很多報紙雜誌在與舊的腐朽的東西作鬥爭的時候，常常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對黨的全面領導作用，尤其是黨對報刊的領導作用處處提出懷疑。不少的作者跑到肯定資產階級民主與資本主義的立場上去了。但是這些缺點和錯誤並不能改變對波蘭報刊的全面的正確的估計和在我們困難重重的兩三年的新的歷史中它所起的創造性的作用，也許今天已經沒有一個不再敢斷言說似乎是報刊引起了波茲南事件或去年的十月事件了。對於1956年發生的十月事件，今天必須客觀地指出，在那決定國家命運的千鈞一發之際，報刊在原則上，在自己的讀者中，在自己主要的環節上是忠实地靠着黨的，積極地幫助黨掌握情況和實現黨的指示。

但是我們要談幾個問題，這些問題不久以前在記者中還引起了懷疑，並且至今還在使徹底整頓報刊內部的工作發生部分的困難。

不久以前，在記者會議上，在編輯部里熱烈地討論了報刊在組織和反映社會輿論方面的任務問題。曾經有人企圖從第二個任務中得出它與第一個任務在原則上相對立的結論；第一個任務似乎本着黨的政策精神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的。很多記者認為，反映社會輿論會給報刊工作中帶來某些不能與黨的當前政策相一致的基本因素。有些人就由此而把報刊看成是與黨，國家和國家機關同樣的獨立的政治力量。在波蘭新聞工作者協會華沙分會會議上有人发出了這樣的論調，這些論調企圖把整個這一問題系統化，並仿照孟德斯鳩關於分裂國家政權的原則提出關於為正確地實行國家的職能所必需的第四部分的論點，即關於報刊的論點。（由於這些懷疑，許多報刊編輯部都想把報紙從委員會機關報改變為全黨的報紙）

（下轉第四版）

傳西方准备提出新的欧洲“开放天空”计划

【合众社伦敦5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报道说，美国代表史塔生准备提出新的欧洲“开放天空”计划。西方希望，这个计划博得苏联改组后的领导机构的同意。

这些人说，这个计划规定对广大的欧洲地区——从西方的西班牙到莫斯科以东很远的地方——进行空中视察。

据这些人说，西方将要求苏联相应增加它所开放的领土。这些人说，法国坚持这一点，作为它同意对它的全部领土进行空中视察的交换条件。

【合众社伦敦5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西方国家已经一致同意考验苏联最近发出的和平号召，它们要求克里姆林宫开放从波兰到乌拉尔山脉的全部苏联欧洲领土，以便进行空中视察。

拟议中的视察区将从西经十度一直伸展到东经六十度。这将包括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和其它一些一直到西伯利亚边界的重要苏联地区。

(上接第三版)

但是，实际上组织和反映社会舆论的职能对立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的。问题本身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是对作为社会舆论代表的报刊多年来所受到的压制的抗议，大家知道，由于这种压制，破坏了报刊在社会上的威信和作用。因为从党的需要和党的政策的观点上看来，报刊反映社会舆论的任务在重要性上并不低于组织社会舆论的作用。党要想正确地掌握自己的工作，就应该很好地了解社会舆论。如果不利用报刊这个良好的反映群众意见和他们的动摇和疑虑的工具，从党的领导方面看那才是愚蠢呢。况且，报刊不能起这项重要的作用，它就同社会没有任何联系，也就不能完成按着党的政策的精神组织社会舆论的任务。

痛苦的经历和悲惨的事件（如像波兹南事件）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无论怎么说，它们是党不了解群众意见和党脱离群众的结果，这种说法已是老生常谈。除此以外，报刊反映群众的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委托给它的任务。虽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可是这两方面的任务是可以，而且应该一并完成的，也只有在一并完成这两项任务的情况下，报纸才算完成了它应有的职责。如果这样来看问题，就沒有任何必要使作为某一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必须不再成为机关报才能起社会舆论的代表这种作用。我完全了解，如果这样判断，我们就会停留在纯理论的范围之内。我们不会看不见报纸在实际执行这两方面的任务时所产生的无数困难。但是，在没有原则性矛盾的情况下，当前困难的解决又另当别论。

让我们再从原则上来看看这个问题。难道在阶级社会中，报纸的独立和它的完全自主是完全可能的吗？没有必要回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所享有的那种臭名远扬的独立或自主去，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报纸往往代表大资本主义的有利可图的企业。在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中，报纸也不可能起独立和完全自主的作用。报纸即使拥有宣传一定的政策或者是号召为了一定的原则而斗争的必要资金，它独立也无法来实现它的那怕是最正确的口号，报纸不能够独立地形成生活，形成生活的是一定的社会力量，报纸可以为一定的社会力量服务，可以创办报纸来为一定的社会力量服务。一个自己提出任务来要改造人民的生活和命运的政党，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机关报，它利用报纸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大部分的任务。在工人运动史上报纸的重要作用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歪曲和降低报纸的作用，仅是一个比较短的时期（而对这种倾向并非完全听之任之）。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难道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吗？同党有联系和为党服务的报纸应当像过去一样摆出官僚主义的作风和死板地“传达”党的决议和指示。显然不是这样。无疑，报纸比党的一切其他环节更为有权利和有义务创造性地完成党交给它的任务。报纸在党政策的指导下应当有可能独立地在党的每个其他的环节中，阐明它所碰到的问题。在遵守了这个条件之后，报纸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当有充分的自由来发表意见，并且还要有更加适合读者兴趣的体裁。在这方面可以把新闻和评论同创作一样看待。从报刊负有反映社会舆论的义务的观点来看，它的独立性具有很大意义。剥夺它这种权利就会根本上破坏它的地位，使它受宠或失宠于以狭隘的准标评价报刊的批评的人们，结果是与党的基本利益和列宁对报刊作用的认识背道而驰。为了党和党的报刊的利益，应该造成相信新闻记者和评论员能完成他们所负的义务的必要的气氛。应该相信他们，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发挥必要的独立性，就像党员为了全党的共同事业所做的那样。

现在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使报刊能够为全党的斗争事业作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贡献，应该做些什么？今天已经无须证明，如果每个党活动家要能按新的方式起作用，他们的职能就不会与从前一样只是作为指示和命令的执行人。

在党的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需要有允许它至少在一定限度内影响党的政治方针的条件。这一原则应当属于政论家和编辑（在这一点上，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逊于党的负责活动家）。同样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所有积极分子，他们应当把自己看成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创造者。必须使他们有机会经常认识到拟定党的具体决定方面所存在的困难。必须使他们经常自动接受就具体问题或一般问题所做出的合理的决定。总之，在以前的党的活动家没有能力供自己的一般职责同政论活动结合起来，同时在报刊号出现了新的政论和编辑人材的新情况下，必须把评论员和编辑培养成为党的活动家，必须达到这样一点：按照列宁的方式从新理解活动家的职能和新闻记者的职能相结合。必须尽量少让那些置身党生活的主流之外，因而陷于仅用自己的话去重复和解释常常连他们自己也不能正确理解的估计和法

令的人们，去评论关于国家或党的重要事务。有些人的思想意识已脱离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矛盾，党的路线和各个决议已被他们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虽然他们不怀恶意，但也可能不愿意接受党在目前所提出的行动方针。这种情况在党的生活中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而对积极的评论员有时会产生有害后果。必须承认，靠党章的有关条款或借助共产党员行动一致的原则来解决这些困难和由此而产生的分歧，这纯粹是形式主义的作法，而且对党的实际要求是毫无保证的。在我们已从个人崇拜的死胡同和个人无谬误的神话中转过来的今天，在党的积极分子中的讨论成为党的力量及其团结的重要因素的今天，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这并不是说每个问题都应当预先讨论和广泛交换意见。在评论员精辟地评论一般问题和正着手解决的困难时，在创造必需的信心气氛时，许多问题，甚至连未讨论完的问题都会得到符合党的政策精神的阐明。

很奇怪，正当报刊作用大大增长了、消除了党和报刊间在过去所积累起来的隔离状态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去诱导积极分子进行积极的活动，而是在党的生活和领导事务中有这样一种有害现象，这种有害现象不是别的，就是从党的机关中排挤报刊工作人员。某些省份甚至任意把新闻工作者从党的机构中剔出去。只有在某些地方报刊编辑和报刊的负责人员才被选入政权机关，这是事实。但是，数年前这方面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这种现象不能用编辑人员水平降低来解释，而只能说潮流是完全逆转了。报刊的基本干部在主要的斗争和各种观点的争论的火焰中成熟和成长起来。说实话：在以前没有阻碍党报编辑列席省委会主席团，他是完全听命于这个主席团的。现在人们不愿在党委员会的领导中或是在它的全体委员中有一个散布怀疑和喜欢争论（有时叫做“发牢骚”）的人。自己必须明白，继续从党的机构中排除新闻记者，就不能帮助党领导报刊，同时使报刊难以实现党的路线。

由于以下事实，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即组织性质上的个别变化，是在对待整个报刊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攻击和神经过敏等不愉快的气氛中发生的。应该承认，有很多对于报纸所提出的责难是公正的，必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神经过敏和攻击的气氛，对于向错误作斗争并无帮助，并且反而会使得整个报刊立场、路线的经常在进步着的形成过程会受到阻碍。应该痛心指出，这种气氛是这样一些人造成的，他们对于十月政纲和八中全会路线的实质不怀好意，并且渴望着摧毁报纸以挽救他们政治上的失败。

1956年10月以后，我们国家和我们党内，发生了生气蓬勃和日益巩固的进步过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亲眼看到了党和报纸之间之分歧日益增长的有害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令人难以相信，甚至是一个悲剧，这常常是因为，在党所领导的、并且在中央委员会八中全会上最后得到了胜利的革新过程中，实际上除了工人阶级、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外，波兰报纸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很明显，可由此得出简单结论，即在党和报纸相互关系上所出现的分歧和困难，不会巩固十月的胜利成果，而只会削弱这些成果。一切自觉的拥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革新的人，拥护我们不得不在复杂的情况下为社会主义作艰苦的斗争的人，都应该竭尽全力来消除一切有碍于这个共同事业的现象。不能忘记，这些困难内部敌人是要加以利用的，对于他们说来，民主化也给他们向社会主义作斗争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而我们的国外敌人，一看到这些争论，也在磨拳擦掌，梦想着我们要垮台。

八中全会以后六个月的经验，可以用来分析某些结论。拥护八中全会行动纲领的党和非党报纸的工作人员，应该整顿他们的工作，校准他们的火力，使得他们的工作成果能够更加巩固十月的胜利。我们的报纸对于目前正在形成的引导波兰及其经济前进的积极行动计划，并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在承认党的行动纲领并信任八中全会所选举的党的领导的同时，报纸却并没有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一切政治结论，并且不会如领导上所有预期的那样，支持它的各项措施。在过去这段时期内，报纸杂志篇幅上持否定和批评态度的文章要写得更好更尖锐些。党也有权利期望波兰的政论作品在探讨未来道路上作出创造性的、大有裨益的贡献。党有权利期望自己的报纸更充分地吸引广大波兰人民群众参加恢复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的斗争，反对一切企图利用我们的困难进行投机的敌对势力的斗争。党和非党报纸的工作人员应该更积极地保卫党和政府的政策，甚至在党和政府的决议暂时还不太受群众欢迎的时候，也要向社会公众解释政策。在这一方面应该作进一步的努力，说服全体党员，使他们相信，波兰报纸，像在争取十月胜利的艰苦斗争时日所曾表现的那样，是可靠的同盟军和战斗的讲坛，用以动员千百万人经常、艰苦但很必要的努力，来实现唯一现实和正确的经济和政治纲领。这并不表示要取消报纸进行公开讨论和批评的权利，也不否认报纸有代表我们社会的进步舆论的义务。报纸可以在其日常活动中得出实现这两方面任务的必要的综合结论，同时也可以从那些肩头担负着发展和领导这十月事业重任的人身上，取得信任。

另一方面，今后也应该改进党对于报纸的领导方法。应该吸引优秀的评论家和编辑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必须按照共同的原则，使他们对于应通过的决议及其实现方法，有可能表示意见。必须更大胆地吸收他们参加党的机关的工作。有可能，很多这样的同志一开始会显得修养不足，或许还不够成熟。但是，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纠正过去在领导评论家方面所犯的错误。

如果谈到党的机关和报纸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经常感觉到有分歧意见和困难存在，但是，消除这些分歧和困难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尽管报纸版面上出现过动摇和错误，但是不能否认，在张纸岗位上还有着—枝相当大的队伍，他们是在思想上有很深刻的认识并且终身和社会主义、和党在一起，永远不会分离的人。这些人可以说服，可以吸引到党的方面来。而且，他们还不只一次用正确的行动证明了，他们了解自己应该站的立场。

傳西方准备提出新的欧洲“开放天空”计划

【合众社伦敦5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报道说，美国代表史塔生准备提出新的欧洲“开放天空”计划。西方希望，这个计划博得苏联改组后的领导机构的同意。

这些人说，这个计划规定对广大的欧洲地区——从西方的西班牙到莫斯科以东很远的地方——进行空中视察。

据这些人说，西方将要求苏联相应增加它所开放的领土。这些人说，法国坚持这一点，作为它同意对它的全部领土进行空中视察的交换条件。

【合众社伦敦5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西方国家已经一致同意考验苏联最近发出的和平号召，它们要求克里姆林宫开放从波兰到乌拉尔山脉的全部苏联欧洲领土，以便进行空中视察。

拟议中的视察区将从西经十度一直伸展到东经六十度。这将包括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和其它一些一直到西伯利亚边界的重要苏联地区。

(上接第三版)

但是，实际上组织和反映社会舆论的职能对立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的。问题本身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是对作为社会舆论代表的报刊多年来所受到的压制的抗议，大家知道，由于这种压制，破坏了报刊在社会上的威信和作用。因为从党的需要和党的政策的观点上看来，报刊反映社会舆论的任务在重要性上并不低于组织社会舆论的作用。党要想正确地掌握自己的工作，就应该很好地了解社会舆论。如果不利用报刊这个良好的反映群众意见和他们的动摇和疑虑的工具，从党的领导方面看那才是愚蠢呢。况且，报刊不能起这项重要的作用，它就同社会没有任何联系，也就不能完成按着党的政策的精神组织社会舆论的任务。

痛苦的经历和悲惨的事件（如像波兹南事件）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无论怎么说，它们是党不了解群众意见和党脱离群众的结果，这种说法已是老生常谈。除此以外，报刊反映群众的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委托给它的任务。虽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可是这两方面的任务是可以，而且应该一并完成的，也只有在一并完成这两项任务的情况下，报纸才算完成了它应有的职责。如果这样来看问题，就沒有任何必要使作为某一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必须不再成为机关报才能起社会舆论的代表这种作用。我完全了解，如果这样判断，我们就会停留在纯理论的范围之内。我们不会看不见报纸在实际执行这两方面的任务时所产生的无数困难。但是，在没有原则性矛盾的情况下，当前困难的解决又另当别论。

让我们再从原则上来看看这个问题。难道在阶级社会中，报纸的独立和它的完全自主是完全可能的吗？没有必要回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所享有的那种臭名远扬的独立或自主去，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报纸往往代表大资本主义的有利可图的企业。在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中，报纸也不可能起独立和完全自主的作用。报纸即使拥有宣传一定的政策或者是号召为了一定的原则而斗争的必要资金，它独立也无法来实现它的那怕是最正确的口号，报纸不能够独立地形成生活，形成生活的是一定的社会力量，报纸可以为一定的社会力量服务，可以创办报纸来为一定的社会力量服务。一个自己提出任务来要改造人民的生活和命运的政党，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机关报，它利用报纸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大部分的任务。在工人运动史上报纸的重要作用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歪曲和降低报纸的作用，仅是一个比较短的时期（而对这种倾向并非完全听之任之）。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难道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吗？同党有联系和为党服务的报纸应当像过去一样摆出官僚主义的作风和死板地“传达”党的决议和指示。显然不是这样。无疑，报纸比党的一切其他环节更为有权利和有义务创造性地完成党交给它的任务。报纸在党政策的指导下应当有可能独立地在党的每个其他的环节中，阐明它所碰到的问题。在遵守了这个条件之后，报纸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当有充分的自由来发表意见，并且还要有更加适合读者兴趣的体裁。在这方面可以把新闻和评论同创作一样看待。从报刊负有反映社会舆论的义务的观点来看，它的独立性具有很大意义。剥夺它这种权利就会根本上破坏它的地位，使它受宠或失宠于以狭隘的准标评价报刊的批评的人们，结果是与党的基本利益和列宁对报刊作用的认识背道而驰。为了党和党的报刊的利益，应该造成相信新闻记者和评论员能完成他们所负的义务的必要的气氛。应该相信他们，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发挥必要的独立性，就像党员为了全党的共同事业所做的那样。

现在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使报刊能够为全党的斗争事业作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贡献，应该做些什么？今天已经无须证明，如果每个党活动家要能按新的方式起作用，他们的职能就不会与从前一样只是作为指示和命令的执行人。

在党的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需要有允许它至少在一定限度内影响党的政治方针的条件。这一原则应当属于政论家和编辑（在这一点上，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逊于党的负责活动家）。同样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所有积极分子，他们应当把自己看成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创造者。必须使他们有机会经常认识到拟定党的具体决定方面所存在的困难。必须使他们经常自动接受就具体问题或一般问题所做出的合理的决定。总之，在以前的党的活动家没有能力供自己的一般职责同政论活动结合起来，同时在报刊号出现了新的政论和编辑人材的新情况下，必须把评论员和编辑培养成为党的活动家，必须达到这样一点：按照列宁的方式从新理解活动家的职能和新闻记者的职能相结合。必须尽量少让那些置身党生活的主流之外，因而陷于仅用自己的话去重复和解释常常连他们自己也不能正确理解的估计和法

令的人们，去评论关于国家或党的重要事务。有些人的思想意识已脱离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矛盾，党的路线和各个决议已被他们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虽然他们不怀恶意，但也可能不愿意接受党在目前所提出的行动方针。这种情况在党的生活中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而对积极的评论员有时会产生有害后果。必须承认，靠党章的有关条款或借助共产党员行动一致的原则来解决这些困难和由此而产生的分歧，这纯粹是形式主义的作法，而且对党的实际要求是毫无保证的。在我们已从个人崇拜的死胡同和个人无谬误的神话中转过来的今天，在党的积极分子中的讨论成为党的力量及其团结的重要因素的今天，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这并不是说每个问题都应当预先讨论和广泛交换意见。在评论员精辟地评论一般问题和正着手解决的困难时，在创造必需的信心气氛时，许多问题，甚至连未讨论完的问题都会得到符合党的政策精神的阐明。

很奇怪，正当报刊作用大大增长了、消除了党和报刊间在过去所积累起来的隔离状态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去诱导积极分子进行积极的活动，而是在党的生活和领导事务中有这样一种有害现象，这种有害现象不是别的，就是从党的机关中排挤报刊工作人员。某些省份甚至任意把新闻工作者从党的机构中剔出去。只有在某些地方报刊编辑和报刊的负责人员才被选入政权机关，这是事实。但是，数年前这方面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这种现象不能用编辑人员水平降低来解释，而只能说潮流是完全逆转了。报刊的基本干部在主要的斗争和各种观点的争论的火焰中成熟和成长起来。说实话：在以前没有阻碍党报编辑列席省委主席团，他是完全听命于这个主席团的。现在人们不愿在党委员会的领导中或是在它的全体委员中有一个散布怀疑和喜欢争论（有时叫做“发牢骚”）的人。自己必须明白，继续从党的机构中排除新闻记者，就不能帮助党领导报刊，同时使报刊难以实现党的路线。

由于以下事实，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即组织性质上的个别变化，是在对待整个报刊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攻击和神经过敏等不愉快的气氛中发生的。应该承认，有很多对于报纸所提出的责难是公正的，必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神经过敏和攻击的气氛，对于向错误作斗争并无帮助，并且反而会使得整个报刊立场、路线的经常在进步着的形成过程会受到阻碍。应该痛心指出，这种气氛是这样一些人造成的，他们对于十月政纲和八中全会路线的实质不怀好意，并且渴望着摧毁报纸以挽救他们政治上的失败。

1956年10月以后，我们国家和我们党内，发生了生气蓬勃和日益巩固的进步过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亲眼看到了党和报纸之间之分歧日益增长的有害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令人难以相信，甚至是一个悲剧，这常常是因为，在党所领导的、并且在中央委员会八中全会上最后得到了胜利的革新过程中，实际上除了工人阶级、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外，波兰报纸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很明显，可由此得出简单结论，即在党和报纸相互关系上所出现的分歧和困难，不会巩固十月的胜利成果，而只会削弱这些成果。一切自觉的拥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革新的人，拥护我们不得不在复杂的情况下为社会主义作艰苦的斗争的人，都应该竭尽全力来消除一切有碍于这个共同事业的现象。不能忘记，这些困难内部敌人是要加以利用的，对于他们说来，民主化也给他们向社会主义作斗争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而我们的国外敌人，一看到这些争论，也在磨拳擦掌，梦想着我们要垮台。

八中全会以后六个月的经验，可以用来分析某些结论。拥护八中全会行动纲领的党和非党报纸的工作人员，应该整顿他们的工作，校准他们的火力，使得他们的工作成果能够更加巩固十月的胜利。我们的报纸对于目前正在形成的引导波兰及其经济前进的积极行动计划，并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在承认党的行动纲领并信任八中全会所选举的党的领导的同时，报纸却并没有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一切政治结论，并且不会如领导上所有预期的那样，支持它的各项措施。在过去这段时期内，报纸杂志篇幅上持否定和批评态度的文章要写得更好更尖锐些。党也有权利期望波兰的政论作品在探讨未来道路上作出创造性的、大有裨益的贡献。党有权利期望自己的报纸更充分地吸引广大波兰人民群众参加恢复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的斗争，反对一切企图利用我们的困难进行投机的敌对势力的斗争。党和非党报纸的工作人员应该更积极地保卫党和政府的政策，甚至在党和政府的决议暂时还不太受群众欢迎的时候，也要向社会公众解释政策。在这一方面应该作进一步的努力，说服全体党员，使他们相信，波兰报纸，像在争取十月胜利的艰苦斗争时日所曾表现的那样，是可靠的同盟军和战斗的讲坛，用以动员千百万人经常、艰苦但很必要的努力，来实现唯一现实和正确的经济和政治纲领。这并不表示要取消报纸进行公开讨论和批评的权利，也不否认报纸有代表我们社会的进步舆论的义务。报纸可以在其日常活动中得出实现这两方面任务的必要的综合结论，同时也可以从那些肩头担负着发展和领导这十月事业重任的人身上，取得信任。

另一方面，今后也应该改进党对于报纸的领导方法。应该吸引优秀的评论家和编辑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必须按照共同的原则，使他们对于应通过的决议及其实现方法，有可能表示意见。必须更大胆地吸收他们参加党的机关的工作。有可能，很多这样的同志一开始会显得修养不足，或许还不够成熟。但是，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纠正过去在领导评论家方面所犯的错误。

如果谈到党的机关和报纸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经常感觉到有分歧意见和困难存在，但是，消除这些分歧和困难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尽管报纸版面上出现过动摇和错误，但是不能否认，在张纸岗位上还有着—枝相当大的队伍，他们是在思想上有很深刻的认识并且终身和社会主义、和党在一起，永远不会分离的人。这些人可以说服，可以吸引到党的方面来。而且，他们还不只一次用正确的行动证明了，他们了解自己应该站的立场。